



百家文库

BAIJIA WENKU

艺术与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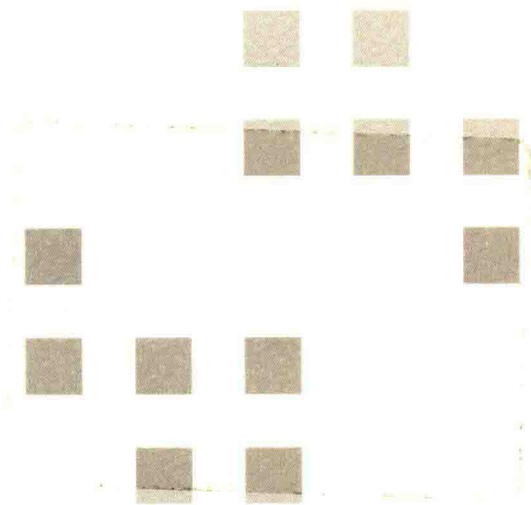
——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中心的考察

YISHU YU LIXING

——YI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WEI ZHONGXIN DE KAOCHA

黄林非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艺术与理性

——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中心的考察

黄林非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原始材料为依托,描述“理性”这一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话语实践,沿历史轨迹重点考察有代表性的作家以及文学史事件所彰显的不同内涵,细致地分梳了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的“理性精神”与“合理性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在中国哲学与美学的理论背景中动态考察、探寻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本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作了富有理论深度的系统阐释,同时也从侧面回应了当下的思想语境和文学生产,既有厚重的历史意识,又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与理性——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中心的考察/黄林非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667-1063-5

I. ①艺…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8529号

艺术与理性——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中心的考察

YISHU YU LIXING——YI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WEI ZHONGXIN DE KAOCHA

作 者:黄林非 著

责任编辑:祝世英 责任印制:陈 燕

印 装: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6开 印张:19 字数:268千

版 次:2016年3月第1版 印次: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1063-5/I·93

定 价:45.00元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174(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zhusy@hnu.edu.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重新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

目 次

第一章 重新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

第一节	理性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4
第二节	相关研究及其学理的不足	16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如何可能	29

第二章 现代中国理性话语考辨

第一节	“理性”的西方背景	47
第二节	“理性”的中国语境	53
第三节	“理性”的话语实践	58

第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康德式命题

第一节	开启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之维	72
第二节	从同声呼应到分道扬镳	88
第三节	一个“二律背反”的典型案例	113

第四章 理性与合理性的颓废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的合理性冲动	133
第二节 节制情感与表现人性	163

第五章 理性与德性的和解

第一节 新旧对立语境中的道德理想	191
第二节 在审美与道德之间	208
第三节 民族品德的重造	226

第六章 理性对诗性的看护

第一节 现代诗歌体式重建	249
第二节 在限制中争得自由	268

参考文献	289
------------	-----

后 记	294
-----------	-----

第一章 重新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

第一章

重新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

第一节 理性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第二节 相关研究及其学理的不足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如何可能

第一章 重新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理性”是十分重要而又极为复杂棘手的问题，它既关涉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也透露出研究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判断。本书欲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考察对象，以“理性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为核心内容，在中西哲学、美学的理论背景中动态考察现代中国理性话语的行进轨迹，探寻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从而超越以往常见的从文学史中抽绎思想的研究模式，并以新的视角一窥艺术与理性的复杂关联。对于这项研究而言，如何设置理论框架以及搭建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是无法回避同时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此前人们曾在“启蒙理性”的框架中对中国现代文学作过深入的探索，其中不乏洞见和卓识，但由于仅仅倚重“理性”的思想指向，而严重忽视了“理性”的美学意蕴，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埋头于深挖、细抠文学中的“思想”元素，不仅对现代作家本人关于“理性”的言说置之不理，而且对“理性”本身与文学的内在关联也漠不关心，因此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考虑到“理性”这一具有元话语性质的概念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频频出现的关键词，同时也是人们进行文学研究时一个口头禅式的评价性用语，本书试图从文学与理性的相关性入手，采用实证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在“理性”的指称意义和评价意义的张力中彰显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以展现被习惯性地遮蔽

于社会政治话语背后的现代中国文学流变过程中的普遍意识结构。这种新的尝试也许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触摸到现代中国文学的律动，也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有益补充。

第一节 理性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理性”是阐释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极为常用的概念，其使用频率之高、使用范围之广，已是一个无须指证的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视阈内，不论是说到启蒙主义思潮，还是论及古典主义倾向，所有研究者似乎都无法避开这一个重要的概念。“理性”这一有着奇特命运的哲学概念“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说，它或隐或显、或远或近地关涉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切重要问题。在近年来人们反复讨论或争辩的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新旧、古今、中西、现代性等话题中，在民主、科学、人民、革命、人性等现代文学的关键词背后，“理性”无疑是一个潜伏得更深的尚需深究的“枢纽”。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围绕着“理性”一词所展开的相关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迹可循、延绵不断的话语体系——“理性话语”。而现代中国的这一个核心话语的构建历程，不仅凸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品格和价值取向，而且也有效地、结构性地规约着其生产动力、运作机制以及主题追求。

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写有《释理》一文，引进了“理性”概念并对之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解释。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提出“理”可以有广义的“理由”和狭义的“理性”两重含义。文章运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观点来解释它们：“‘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之间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意

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上之意义也。”^①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从哲学的高度批判了朱熹等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特别是其道德宿命论和形而上学的“理一分殊”说。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为理论武器，从“理”的客观的假定和主观的性质来进行解析，所以认为“理”是“主观上之物”，拒绝“理”具有客观法则的可能性。在王国维那里，理性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而仅仅只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它并不是什么世界的本原，而只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认识能力，且与“伦理学之所谓善”无关：“理性者，不过吾人知力之作用，以造概念，以定概念之关系，除为行为之手段外，毫无关于伦理上之价值。”“至叔本华出，始严立悟性与理性之区别。彼于充足理由之论文中，证明直观中已有悟性之作用存。吾人有悟性之作用，斯有直观之世界，有理性之作用而始有概念之世界。”可见，在理性观上，王国维与重直观而贬理性的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颇多吻合。

叔本华认为只有从直观而不是从理性出发，才能够认识到作为世界本体的意志的本质。对此，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曾有介绍：“至叔氏哲学全体之特质，亦有可言者。其最重要者，叔氏之出发点在直观（知觉），而不在概念是也。……彼之美学、伦理学中，亦重直观的知识，而谓于此二学中，概念的知识无效也。”在叔本华看来，审美作为一种认识方式所具有的最基本的规定性是对理念的纯粹直观。传统的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根本特征就是把理性置于感性之上，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而感性认识只能把握事物的现象。叔本华则贬低理性，认为“直观总是一切真理的源泉和最后根据”。^②他说，审美“突然把我们从欲求的无尽之流中托出来，在认识甩掉了为意志服务的枷锁时，在注意力不再集中于欲求的动机，而是离开事物对意志的关系而把握事物时，所

① 王国维：《释理》，《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页。

②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3页。

以也即是不关利害，没有主观性，纯粹客观地观察事物”。^①叔本华肯定直观把握真理的能力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在于把西方哲学中崇科学而贬艺术的主导倾向颠倒过来，为艺术地位的提升创造了前提条件。而王国维对文学的独立性的提倡、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观念的批判也因此而顺理成章。王国维坚决反对功利主义，在中国率先旗帜鲜明地倡导建立现代知识制度上的与科学、道德等分治的“纯文学”观念，可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

由王国维开启的关于“理性”的言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是隐在的，其影响十分深远，不过直到今天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之后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启蒙运动则急切地倡言理性，且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历史后果。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第一篇文章中就说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主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灵智，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科学法则）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②又说：“神秘宗教，诉之理性，决其立言之不诚。”^③翻检《新青年》杂志可以看到，在汪叔潜、李亦民、刘叔雅、高语罕等人的文章中同样有“理性”一词的运用。陈独秀以理性的名义，极力推崇科学精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里的“理性”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它已经与神性划清界限，按照卡西勒的说法，它就是一种引导人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它与“科学”“实证”“实利”等概念相联系，又可看作一种经验知识，因而很自然地，它就成为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和愚昧盲从等思想意识的强大武器。

①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4页。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③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

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进化论的广泛传播、实证主义的巨大影响、新旧问题的论争和文学革命的发生，都参与了现代中国理性话语的建构，或者说，都是这种话语建构的具体组成元素。李大钊早就发现传统的“附属型”“家畜型”人格的病根不仅在于“情性太深，奴性太深”，尤为重要的是“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① 鲁迅也提倡理性，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里，他就援引黑格尔的观点，主张“以科学为宗教”，别立“理性之神祠，以奉19世纪三位一体之真者”。他曾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闷，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② 在鲁迅看来，强大清醒的理性无疑比怨激之情更为重要，煽动国民的激情是不可取的。傅斯年要求文学要有“逻辑”“思想”，也是用“理性”这个词语来表述的。他认为理想的白话文应是“逻辑的、哲学的、美术的”，好的文学应“能引人感情，启人理性”。^③

当西方世界大呼“理性破产”“科学破产”，并由此而导致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盛行并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之时，中国的五四先驱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大力倡导理性精神。启蒙者以科学、实证、批判、改造社会为内涵的“理性”话语，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回应了社会现实生存的需要，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衍生扩展的能力。由胡适首倡的白话文运动是这一理性话语在文学领域的最初实践，继而从问题小说到现实主义思潮再到左翼文学，“理性”观念以义无反顾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踏步穿行，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一股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人们普遍认为，五四时期，启蒙者用理性的眼光去观察一切问题，评判一切现象，衡量一

①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

② 鲁迅：《坟·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226页。

③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5月。

切价值，在文学创作中就必然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主题追求。基于国民性对启蒙理想的严重阻害，启蒙作家用有力的笔触“撕去假面”“攻打病根”，揭出国民的愚昧、保守、迷信、麻木、苟且、孱弱等痼疾，“活画出一个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如果说以鲁迅的《呐喊》《彷徨》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是启蒙叙事的典型文本，那么，到茅盾那里，理性话语则包含了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冷静的解剖分析、文学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等构成元素。受到以科学为主要内涵的理性观念的影响，茅盾先是提倡文学为人生，再进一步指出要把人生照真实的原样写出来，更要注意到科学的精确性，再到后来则怀抱用小说对现实社会阶级状况进行分析判断的雄心，写成了他的代表作《子夜》。不过应该看到，这里所说的科学、理性，主要与对文学产生了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相联系，它本身在本质上是外于文学的。

19 世纪初的欧洲文坛上，随着理性之霾愈来愈浓，曾出现过一种作为反拨力量而出现的浪漫主义思潮。这一派的作家把理性视为套在文学脖子上的沉重枷锁，认为理性阻碍了感情的自由发展，他们要求解除理性的束缚，解放情感，回归自然，并倡导表现人的内心情感，人的主观感受。类似的情形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演。创造社对新文学初期文学理性化的倾向深为不满，他们提出了反对“哲理”“理智”的主张。郁达夫认为“天才的作品，都是 abnormal, eccentric, 甚至有 unreasonable 的地方，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终究是不能理解的”。^① 成仿吾在《诗之防御战》中就认为文学是直诉于人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把“文艺的玩赏”看作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冲”；文学的目的，并不是一种“理智的报告”，而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情感的传达。成仿吾强调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特别是对诗歌而言，情感便是它的始终。“理智是我们的不忠的奴仆，至少对于诗歌是这般，”成仿吾说，“他是不可过于信任的，如果我们过于信任他，我们所筑成的效果，就

^① 郁达夫：《艺文私见》，《创造》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22 年 3 月 15 日。

难免不为他所打坏。而最可恶的叛徒，便是浅薄的理论（reasoning）”，“一切因果的理论与分析的说明是打坏诗之效果的”。他指出，“象吃了智慧之果，人类便堕落了一般，中了理智的毒，诗歌便也要堕落了”，所以，“我们要发挥感情的效果，要严防理智的叛逆”。在这篇文章中，成仿吾举出胡适《尝试集》中的《他》《我的儿子》《乐观》等诗作，批评它们为“鄙陋的噪音”，认为“把哲理夹入诗中，已经是不对的；而以哲理诗为目的去做，便更不对了”。^① 这种对当时出现的许多文学作品较为普遍的说理、议论倾向的反思，显然包含了与新文学初期启蒙者不一样的理性观。创造社曾极力推崇个性，主张艺术的主观性，留下了很多“喊叫”自身苦闷的作品，用沈从文的话来说，他们是“缺少理智，不用理智”的。有意思的是，创造社后来的文学主张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一转变仍然可以通过其对“理性”的态度的变化加以把握。到了1926年，同是创造社成员的穆木天反过来明确地提倡写实，提倡“理性的艺术”。他说：“写实不是一种随随便便的东西；写实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是一种真挚的态度。必在自我意识最强的时候，必在哲学思索最深的时候，才会有写实文学的发生。写实文学是静者的产物，是理性的艺术。”^② 郁达夫还曾专门作了一篇《文学上的智的价值》，强调文学必须合乎理性。他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一受外界刺激，除只有反射作用发生的诸刺激外，总须起内心的作用”。而文学所具有的智的价值，就是读者在阅读之后，“心里所感到的一种目的意识，能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和扩大起来的那一种文学上的效用”；“不合逻辑的文学，终于不是伟大的文学；尤其是小说与戏剧的两种，是非要合乎理性不可的”。^③ 创造社作家文学观念的前后变化，可以在与“理性”观念的“互文”的喻说关系中获得理解，这个变化过程也说明，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始终摆脱不了理性话语的纠缠。

① 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第1号，1923年5月13日。

② 木天：《写实文学论》，《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1926年6月16日。

③ 郁达夫：《文学上的智的价值》，《现代学生》第2卷第9期，1933年6月。

在文化倾向与《新青年》明显相异的《东方杂志》上，也高高飘扬着理性的大旗。杜亚泉的许多篇章中，理性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核心词汇。他说：“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驱，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枯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为动物之藪泽矣。”^①又说：“吾国道德思想，虽与希腊为近，然理性之本出于天，理性之用致乎人，体天意以施诸人事，修人事以合乎天意，其戒谨恐惧之心，与修身事帝之念，则又与希伯来思想若合符节。”“至科学上之学说，如竞争论、意志论等，虽各有证据，各成系统，但皆理性中之一端，而非其全体，当视之与诸子百家相等，不可奉为信条。”^②他曾抓住蒋梦麟“以感情与意志为思想原动力”的说法，批驳蒋“是将人类的理性，为情欲的奴隶”。^③杜亚泉不仅坚决地强调整理性，而且将人们通常认为最具理性精神的启蒙者判为丧失理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值得探究的现象。他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1卷第2号的《理性的势力》认为“欲望理性，初为同源，继为对待”，理性与武力不相容，经济势力也能消灭理性，推而论之，理性又易陷于迷误，“因时而屡有变迁”。他呼唤和平中正的理性，希望理性能战胜欲望。《东方杂志》认为科学并不等于理性，其所推崇的理性包含着对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深深忧惧，从而形成了与启蒙理性相颉颃的另一个思想文化维度。与之论调相近的还有稍晚的学衡派。《学衡》通过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介绍，广泛涉及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观念，并谋求西方理性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学衡》杂志所载的文章中，“理性”和与之含义相近或等等的“理智”同样是十分打眼的重要词语。吴宓的《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中，“理智”一词出现了79次之多，缪凤林的《希腊之精神》中，则计有49次用到“理性”一词。吴宓为胡先骕的《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④所加的按语说：“然以物质之律施之人事，则理智不

① 杜亚泉：《精神救国论（续二）》，《东方杂志》第10卷第3号，1913年9月。

② 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4月。

③ 蒋梦麟：《何谓新思想》，《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1920年2月。

④ 胡先骕：《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学衡》1922年3月第3期。

讲，道德全失，私欲横流，将成率兽食人之局。”“白璧德先生之说……以理智为本，重事实，明经验，此其所以可贵。”在许多文章中，是否合乎“理性”，是评判事物的最重要的标准。刘伯明说：“共和国民，不惟负责而具有贡献之精神，亦须能屏除私见，而惟理性之是从。”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夫所谓理性者，非仅凭空思考，不顾事实，此抽象之理性，非余之所谓理性也。”^①《学衡》第21期载有吴芳吉的《再论吾人眼中的新旧文学观》，文章说：“即不然，必为激刺之作，亦当本于理性，不可徒肆感情。”“故吾人以为无论文之属于激刺，属于安静，要不可不本与感情，复不可不纳于理性。”

杜亚泉强调理性，多在社会文化的角度展开论说，和文学还保持着较远的距离；学衡派所主张的理性，则是与其文学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学衡派没有留下很多文学作品，但其对于文学的思考是深刻的，其推扬的文学观对后来的理论和创作均有长远的影响。学衡派受新人文主义的熏染，倡导文学的理性精神，强调文学的道德意义，注重“和谐”“节制”，但又并不排斥感情。吴宓毕生追求“真情”与“至理”的统一，在文学观上，对安诺德的“诗专重理智思想而不及情感”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说，“古学派（一译古典派）之伦理的主张，乃一各种性行元素之调和融洽……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之上品，如荷马之诗，苏封克里之悲剧，以及恒吉尔（Virgil）之诗，其描写感情想象非不强烈，岂仅专重理性者”；“后来之新古学派及伪古学派，特重一偏之理性，致由浪漫派之反动，专务提倡感情及想象。写实派继浪漫派而兴，复趋他一端，专主以冷静之头脑，观察社会人生之实况，详加描写，不参己见，其所重者乃为科学之理性”。^②显然，吴宓称欧洲古典主义为“新古学派”和“伪古学派”，因为它“特重一偏之理性”，所以对之持批判的态度；而写实派强调科学理性，也容易走向缺乏感情及想象的另一种偏枯。他强调诗与文“各

① 刘伯明：《共和国民之精神》，《学衡》1922年10月第10期。

② 吴宓：《文学与人生》，《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期，1928年1月13日。

该表示思想及情感，兼有其二，不废其一”。^① 这样，学衡派以和谐为旨归的重视“理性”的文学观就明显地与唯理主义观念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理论分野。

新月派作家也将理性作为其理论和创作的重要标尺。《新月》创刊号刊载了徐志摩的《汤麦士哈代》，文章指出，肇始于卢梭言行的现代“自我解放”与“自我意识”，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延续了170年。在这一百多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迸窜着。在这光炎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同时在灰烬的底里孕育着‘现代意识’，病态的、自剖的、怀疑的、厌倦的、上浮的炽焰愈消沉，底里的死灰愈扩大，直到一种幻灭的感觉软化了一切生动的努力，压死了情感，麻痹了理智，人类忽然发见他们的脚步已经误走到绝望的边沿，再不留步时前途只是死与沉默”。^② 在徐志摩看来，理性的缺席使得现代主义美学思潮走向了自我否定，冲动性的情感最终只能带来混乱与绝望。同一期杂志还载有徐志摩的《白郎宁夫人的情诗》，其中说：“爱是不能没有的，但不能太热了。情感不能不受理性的相当节制与调剂。”《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中的《敬告读者》，旗帜鲜明地倡导理性精神，把理性当作办刊的宗旨和努力的方向：“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新月派的首席理论家梁实秋曾问学于白璧德门下，和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胡先骕等《学衡》作者的文化观念相近，但梁实秋更专注于文学本身，他的文学主张是紧紧围绕“理性”而展开的，譬如《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就有22次用到“理性”一词。他说：“头是理性的机关，里面藏着智慧；心是情感的机关，里面包着热血。”^③ 真实的自我，不在感觉的境界里面，“而在理性的生活里”，所以要表现自我，就不能专靠感觉境

① 吴宓：《诗学总论》，《会通派如是说——吴宓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② 徐志摩：《汤麦士哈代》，《新月》第1卷第1期，1928年3月。

③ 梁实秋：《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